

中國皇帝皇后百傳

朱學勤 主編

秘檔

宋神宗

史可以知興替，讀史使人明智。英國思想家培根語。讀史了解歷史的重要性于此可知。而歷史是生王后更是对历史进程的发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因此了解「帝王的活动史」无疑也就是在「他们就是」一英主」也不管是一辈子嘴边流着哈拉子的白痴，不管是掌管人命的暴君，他们就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头子」是一万乘之尊一家天下的封建格局就决定了他们具有「大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封建集权制度使「天子们的一举一动对几千年」因此了解了这些口含天宪的朕们的活动，对于了解中国封建历史具有相当重要意义。





中國皇帝皇后百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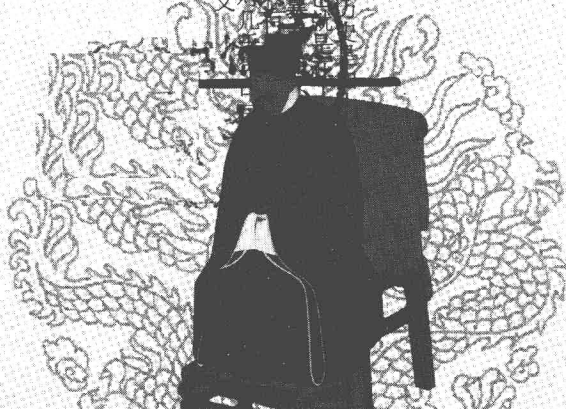
朱學勤

可以知兴替一读史使人明智」英国思想家培根语
「生王后更是对历史的进程发生了一辈子不可低估的影响」因此了解「帝王」的活动史无疆也
「他们就是」一英主一也不管是一「万乘之尊」一家天下「的封建格局就决定了他们的一举一动」
「之下莫非主土」「莫非王臣」封建集权制度使「天子」们的「一举一动」都具有重要意义
「影响」因此了解了这些口含天宪的「朕」们的活动 对中国封建历史具有相当重要意义

宋神宗

藏書坊

ONLINE BOOKSTORE
OF THE EAST ASIAN AND
PALEONTOLOGY IN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皇帝皇后百传/朱学勤编著 远方出版社, 2005
ISBN 7-80595-771-1

I. 中... II. 朱... III. 远... IV. K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53545 号

书 名	中国皇帝皇后百传
主 编	朱学勤
责任编辑	王顺义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
经 销	内蒙古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mm × 1 168 mm 1/32
印 张	660
字 数	19008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595-771-1/K·28
定 价	1848.00 元 (全 66 卷)



前 言

明君、忠臣、顺民、盛世太平景象，为历代帝王梦寐以求。可是，纪元两千年，走马灯似的换了大小几十个朝代、几百个皇帝，都破灭了帝王梦。说什么长安、长治久安，道什么天安、地安，从来就没有过平安，不是疆场上的刀光剑影，就是宫廷内部的血雨腥风，诚如《三国演义》开篇所云：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亦如马克思所总结的那样，历史从来都是螺旋式上升的。

中国的历史在封建社会阶段徘徊、漫步、乃至止步不前、倒退，有明主，有昏君，明主开国治国，昏君丧国亡国，都那么道貌岸然地称孤道寡君临天下，“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又都做了匆匆过客，化入史册。于是，就诞生了这套66册的记载帝王后妃故事的精选本。

明君，勤政爱民、多谋善断、兼听从谏，国运昌盛，黎民安居乐业，臣呼君万岁，民盼国万岁。

昏君，坐吃山空、声色犬马、恣意淫乐，国势衰微，百姓水深火热，卖儿鬻女，逃荒要饭，直至扯旗造反。

更有后宫肆虐，耐不了寂寞，更耐不了主子的朝三暮四朝秦暮楚，始幸终弃，由争风吃醋到干预朝政，与宦官



勾结，和太监联手，导致祸起萧墙、后院失火，让那些昏君们个个丢九五之尊，或明杀或暗害，不得善终。

祸根在哪？千年历史，不外乎塞言路、崇奸佞、近小人。小人近乎苍蝇，无缝也寻隙，到处下蛆。中国的文化是酱缸文化，不谬。有人说，读懂中国，先了解宫廷和妓院，更为至理明言。

一篇读罢头飞雪，人生何其短暂！从独裁到民主，从野蛮到文明，该是一条多么漫长的道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求索了几个千年，才迎来了这“雄鸡一唱天下白”的民主。

其实，我们的先祖是聪明的，对于江山易主，兴亡更替，早就研究透了，《岁别要览》说：贫穷生富贵，富贵生淫逸，淫逸生骄奢，骄奢生贫穷。周而复始像个怪圈，恶性循环了几千年。尽管总结前朝经验教训的史书汗牛充栋，尽管小皇子刚咿呀学语就请教师灌输帝王之术，仍然挡不住历史的车轮飞转。

也许，这正应了马克思的论断，凡是在历史中出现的，都要在历史上消亡。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俗话说，当事者迷，旁观者清。皇帝、后妃们都是局内者，皆为权欲所迷。我们做为旁观者，茶余饭后兴之所至，从书籍中领略一下曾经激荡过的历史风云，未尝不是一件放松身心的好事。

编者

2005.9



目 录

第一章	入执九五	(1)
第二章	准备变法	(17)
第三章	熙宁变法	(35)
第四章	军事改制	(74)
第五章	两派争斗	(93)
第六章	神宗亡于安石	(144)
第七章	元丰新政	(179)
第八章	对外战争	(201)
第九章	身后余音	(230)



第一章 人执九五

一、年少生活

神宗名赵顼，英宗长子，生母为宣仁圣烈皇后高氏。庆历八年（1048年）四月生于濮王宫，传闻出生时“祥光照室，群鼠吐五色气成云”，这当然是附会之说。八月，赐名钟鍼。授率府副率，三迁至右千牛卫将军。嘉祐八年（1063年）侍英宗入坑庆宁宫，英宗继位后，授安州观察使，封光国公。同年九月，加忠武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淮阳郡王，改名顼。治平元年六月，进封颍王。治平元年（1064年）三月，纳故相向敏中孙女为夫人。十二月，立为皇太子。

神宗继位前的经历大致如上，由于材料的缺乏，我们对他的成长过程不可能有太详细的描述。神宗继位时仅20岁，可以说乳臭未干，可他执政不久就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表现得很有计划、有远见，决非一时头脑发热盲目冲动，也决不仅仅像某些人所说的完全受了王安石的影响，这说明他在当皇帝以前就早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理想，有了坚定的政治抱负。从散见的有关神宗早年生活、学习及交友等各方面的材料，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

（一）聪明好学，有极强的求知欲

颍王天资好学，博览群书，于经、史、子、集无所不涉，这



在宋代诸帝中是相当突出的。嘉祐年间在东宫学习时，颍王经常废寝忘食，甚至内侍不得不提醒他已到了吃饭时间，他却说：“听读方乐，岂觉饥耶？”英宗见他读书太多，怕累坏了身体，经常让内侍强迫他放下书本。在条件优裕的皇宫里不必为了科考而严格要求自己，能如饥似渴地涉取各种知识，确实是需要极大的毅力的，这说明他自少年就有远大抱负，绝不做流俗之辈。

颍王还有极强的颖悟力，智力在诸弟之上。年幼时，侍读孙思恭讲《孟子》，讲到“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寡助之至，亲戚畔之”时，思恭泛引古今助顺之事，而未引亲戚离叛之事。颍王不满意，补充说：“微子，纣之诸父也，抱祭器而入周，非亲戚畔之耶？”讲的是箕子叛商从周之事，事实确凿，思恭听后惊骇不已。其聪明睿智、闻一知十之能力，由此可见一斑。

颍王这种勤奋好学的精神，即使在继承帝位后，也始终坚持不懈，这是难能可贵的。

（二）谦虚律己，孝敬有礼

皇子在宫中都要接受严格的教育，读经史、习礼仪，颍王和他的兄弟们自然不能例外。颍王对自己要求极严格，讲读时为了表示对老师的尊重，一定做到“正衣冠，拱手，虽大暑，未尝用扇”。颍王性格谦逊，对属僚常厚爱有加，很少有无理训斥周围属僚的时候。颍王府记室参军、直集贤院韩维有才华，尤其得到颍王的宠爱和尊敬，他们常在一起谈古论今，议论国家大事。在日常言行举止方面，韩维对颍王要求很严。一次颍王与韩维论天下事，谈到“功名”二字的时候，韩维说：“圣人功名，因事始见，不可有功名心。”不言功名，寓功名于谋事之中，这正是神宗后来的行为准则。还有一次近侍拿弓样鞋献上，韩维严肃地



说：“王安用舞靴？”颍王听后面有愧色，立即让人毁掉。父亲英宗与太后有些矛盾，英宗在一次病重时出言不逊刺伤了太后，太后很难过，向大臣哭诉，并归咎于颍王及其弟赵颢。此时朝政大权掌握在太后手中，加之英宗又非仁宗嫡出，因此太后废英宗犹如反掌。韩维赶紧劝说神宗：你父亲已失太后欢心，你应对太后克尽孝恭以弥补你父亲的过失，否则，父子可要一起遭祸了。颍王感悟，及时向太后作了解释。太后终于因此原谅了英宗，并高兴地对大臣说：“皇子近日殊有礼，皆卿等善择官僚所致，宜召致中书褒谕之。”这里太后既表扬了神宗，也表扬了韩维，由此神宗对韩维更是信任有加，几乎是言听计从，这也对神宗的一生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颍王继位后，马上任用安石为相，就是韩维鼎力推荐的结果，没有韩维，就不可能有安石的起用。神宗不起用安石，就不会有后来的熙宁新法；即使有，也可能完全是另外一副样子。说起来这是历史的偶然性，可见偶然性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三）崇尚法家，尤其喜读《韩非子》

颍王在东宫读书时，博涉儒、法、兵、墨等各家之学，（兵学方面容后文详及）。在法家之中，他尤其喜欢韩非。

韩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他不仅吸收了前期法家的思想，而且广泛采纳了道、儒、墨等各家有关治术方面的理论。韩非主张，掌权者应“不务德而务法”，“赏厚而信，刑重而必”，法律的制订应该“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他综合了商鞅的“法”治，申不害的“术”治，慎到的“势”治，提出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君主统治术。因为韩非的理论最具有可操作性，所以历代有作为的帝王无不以韩



非的理论为座右铭，尽管他们口头仍强调儒家学说，把儒家学说作为统治国家的意识形态，但实际上实行的却大多都是法家的一套。神宗年轻时就重视法家理论，重视韩非的学说，应该说是颇具慧眼的。

治平二年（1065年）十月的一天，颍王拿出自己亲手抄录的《韩非子》让府僚校对，不想被侍读孙永看见，孙永不满地说：“韩非险薄无足观。”颍王怕事情闹大，遭到太后和父亲的指责，就掩饰说：“录此备藏书之数，非所好也。”很显然，这决不是心里话，如果真的是自己“非所好”，是不可能把《韩非子》一书从头到尾认认真真抄一遍的。只是因为严格的皇子教育中，经史子集及六艺，并不包括法家学说；整日抄录《韩非子》，岂非不务正业？颍王正是因为这样“不务正业”，正是因为受了法家思想影响，才有了后来轰轰烈烈影响深远的改革大业，才使自己超出流俗之辈而成为一个有作为的皇帝。

二、英宗早逝

宋英宗（1032 - 1067年），名赵曙，真宗弟商王赵元份孙，濮王赵允子。因仁宗无子，嘉祐七年（1067年）被立为皇子，封巨鹿君公。次年仁宗死，遂即位。即位初期，因身体欠佳，由曹太后垂帘听政。治平元年（1064年）五月病愈，在宰相韩琦等人的敦促下，曹太后同意撤帘，英宗开始亲政。

英宗天性笃孝，喜欢读书，“不为燕嬉褻慢，服御俭素如儒者。每以朝服见教授，曰：‘师也，敢弗为礼，’”当时国子监直



讲、吴王宫教授吴充献上《宗室六箴》（视、听、好、学、进德、崇俭），仁宗命宗正缮写后颁赐宗室子弟。英宗时在藩邸，遂把《六箴》工工整整抄在屏风上，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由此可见英宗做事的认真态度及对自己的严格要求。英宗 30 岁继承帝位，应当说是施展才华的大好机会。在位几年间，他任用贤臣富弼、文彦博等，虚心纳谏，“臣下有奏，必问朝廷故事与古治所宜，每有裁决，皆出群臣意表”，可见其从善如流的优秀品格。他生活俭朴，不尚虚荣，常释放宫女，大臣们屡次上封号，皆被拒绝。这些优点被他的长子神宗所继承。鉴于仁宗以来的弊政，英宗“有性气，要改作”，提出了“积弊甚众，何以裁救”的问题，显示出要改革的意图和决心。只可惜英宗英年早逝，没来得及施展自己的才华，若假以时日，他可能会有比较大的作为的。史载其“志在有为”，所以他死后庙号谥为“英”。

大概继位以前英宗的身体就出现了问题，因为英宗继位的当年（嘉祐八年）就不能御殿处理公务了。此后的几年间，身体一直不佳，听政亦是时断时续。他在位的几年，朝廷在各方面未有大的动作，恐怕与英宗的身体状况直接有关。

英宗有四子，即长子颍王赵顼、次子赵颢、三子赵颢、四子赵颢。三子中，神宗最为出色，这在君臣中是有口皆碑的。龙图阁直学士李柬之多次在英宗面前称赞神宗：“英睿仁厚，社稷之福也。”英宗听后大为高兴。诸臣对颍王的夸奖并非为了讨好，而是有着比较深层的考虑的，这就是因为英宗身体不好，继统大事应该早定。然而英宗刚继位不久，且又年轻，谁也不便直说，于是出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治平二年（1065 年）六月，宰相韩琦等表请序位在颍王以下。韩琦等人的目的很明确：加强颍王



的地位，万一发生不测，即使来不及立皇太子，颍王也能顺理成章地登上帝位。英宗开始不同意这个意见，但在众臣的一再要求下，最后还是同意了，规定颍王地位在富弼以上，弟颍在监察御史里行宋庠以下。此举等于让诸臣吃了一颗定心丸，此后一段时间直至英宗病危前，宰臣们未再提立皇太子之事。

治平三年（1066年）二月，颍王府翊善邵亢认为神宗已近成人（古人20岁行“冠礼”，标志着已为成人），应该结婚成家，皇室子弟更重视此事，于是他上书给英宗：“皇子颍王，天质早茂，姻媾及期。方陛下继位之初，而元嗣克家之日，推之于礼，莫重于斯。”又主张恢复古婚礼，说：“陛下初政，欲治国者先齐其家，颍王且授室，愿采用古婚礼。”英宗表示同意，并命礼院详定聘纳礼仪，同时遣使到各大臣之家为神宗择人，记室韩维认为，皇子婚配应选名门之女、德才之人，他说颍王孝友聪明，动止皆有法度，正是年轻学习培养道德之时，故“宜历选勋望之家，精拣淑哲之媛，考古纳采问名之义，以礼成之，不宜苟取色而已”。经过严格的挑选，最后选定了已故宰相向敏中的孙女，并封之为安国夫人，这就是后来的向皇后。

从治平三年（1066年）十月起，英宗的病情加剧了，为了安定众心，英宗并未告知诸位大臣。作为长子的赵项，非常了解父亲的病情，于是请求父亲效法仁宗故事，把每天必有的迓英殿讲读改为两天一次，英宗表示同意。十一月，英宗的病情恶化，卧床不起，服药不见疗效。十二月，监察御史里行宋庠、宰相韩琦等人请立皇太子，英宗大不高兴，奏书被封。可以想见，正值壮年的英宗对未来还抱有希望，并没有把自己的病情看得过于严重，因而对他拒立皇太子的做法并不难理解。而大臣们此时提出



立皇太子，是从国家安定的角度来考虑的，为此他们不惜得罪皇帝，精神着实可嘉。

面对父亲严重的病情，颖王忧心如焚。一天，韩琦问英宗起居毕，遇到“忧形于色”的颖王，颖王焦急地问怎么办。韩琦说：“愿大王朝夕勿离左右。”颖王说：“此乃人子之职。”韩琦严肃地说：“非为此也。”颖王理解到韩琦话中的意思，遂点头离去了。英宗在位的几年中，朝中大多是老臣，他们忠心耿耿，始终从国家大局出发，没有出现上层权力的争斗现象，即使在英宗病棕之时，也没有人敢于胡来，这真是国家之大幸。

经多方医治，英宗的病终于没有好转。自十月份起，英宗就卧床不能说话，凡奏表公文之类只能写在纸上。从症状看，英宗很可能是中风，而且越来越严重了。韩琦再次请求立皇太子：“陛下久不视朝，中外忧惶，宜早立皇太子，以安众心。”英宗此时可能意识到了自己病情的严重性，终于点头同意了。韩琦请英宗亲笔写下继承人的名字，英宗乃写道：“立大王为皇太子。”“大王”应该是颖王赵顼，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但经验丰富的韩琦仍坚持让英宗写得更清楚些，以免以后生出麻烦，说：“必颖王也，烦圣躬更亲书之。”英宗于是又在后面写上“颖王顼”三个字。韩琦马上命翰林学士草制，决定明年正月十九日正式册皇子颖王赵顼为皇太子。至此，大臣们总算深深地出了一口气。英宗虽然采纳了大臣们的意见，自己心里却非常难过，竟泪流满面。文彦博退朝后对韩琦说：“见上颜色否？人生如此，虽父子亦不能无动也。”韩琦也伤感地说：“国事当如此，可奈何？”

治平四年正月丁巳日，英宗崩于福宁殿，在位不满4年，年仅36岁。神宗即帝位，时年20岁。



三、初承大统

颍王顺利地立为皇太子及登上帝位，可以说是老臣韩琦等人妥善安排的结果，他心里非常感激，因此在继位之初首先重用这批老臣，分别委以重任：以韩琦守司空兼侍中；曾公亮行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进封英国公；文彦博行尚书左仆射、检校司徒兼中书令；富弼改武宁军节度使，进封郑国公；吴奎复授枢密副使；曹佾改昭庆军节度使、检校太傅；张升改河阳三城节度使；宗谔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改集庆军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欧阳修、赵槩并加尚书左丞，仍参知政事；陈升之为户部侍郎；吕公弼为刑部侍郎等。这样，神宗先稳定了局势，表示政策不会改变，大臣们各行其事各安其位足矣。不久，张方平、赵抃并为参知政事，以权御史中丞司马光为翰林学士。到治平四年（1067年）九月，王安石亦为翰林学士，不过，这时王安石在朝廷中还没有多少说话的权力。

说起颍王继位，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英宗驾崩时，韩琦等人皆守候床前，急令召入皇太子。皇太子尚未到，英宗的手忽然动了一下，曾公亮大惊，马上告诉韩琦，怕英宗死而复生，岂不有大逆之罪？韩琦镇定自若，坚持不改变主意，仍让神宗按既定安排登位，他说：“先帝复生，乃太子皇！”危难时刻，可见老臣胆识非一般人可比。由于韩琦的谋略和忠心，神宗在位期间，对他特别尊敬，即使在韩琦激烈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时候，神宗仍称他是“忠臣”，不同意给他过重的处分。



神宗是一位有主见而且性格相当坚强的年轻皇帝。继位伊始，他虽然为失去父亲而悲伤，但他化悲痛为力量，立即把全部精力用在了处理繁杂的政务之中，给大臣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从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继位到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正式实行变法，神宗大致做了以下工作：

（一）节省开支，消除弊政

由于庞大的军队及官费开支，宋朝财政到了仁宗末年已是非常困难。神宗继位后面临的第一笔最大的费用支出就是英宗陵寝的建造。是大肆动用人力物力财力大兴土木，还是根据实际情况节省开支？神宗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他派王陶到河南府，并赐手诏说：“朕深惟山陵所费浩大，方今府库空竭，民力凋敝，正当扶危拯溺之际，而国家四岁两遭巨祸，志虽切于简省，又虑有司不能遵奏从约之旨。今遣卿往河南府计置，凡事须节省，有切时先务者，亦宜奏闻。”尽管神宗面临着被后人指责为不孝的危险，但他还是从实际出发，决定简办丧事，不铺张浪费，这么做在当时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根据常规，新帝继位照例要恩赐宗室子弟及近臣，神宗自然不能例外。但神宗有自己的考虑：仁宗在位40余年，宫中富饶，故恩赐宗室近臣特厚；而英宗在位仅4年，当然不能和仁宗相比。他做出决定，恩赐照样要有，但只能是以前的三分之一。这样做既没有违犯常规，又达到了节约的目的。

（二）广求直言，择善而从

英宗在位的几年，由于身体不佳，没有精力处理公务，因而基本维持仁宗时期的现状，庆、嘉年间遗留的诸多弊端延续了下来。神宗继位后，明白地看到了这一点，决心加以改革，但在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传统社会中，如果一开始就大张旗鼓明目张胆地修改祖宗的成法，不但会遭到朝廷老臣的极力反对，更对遭到舆论的谴责，甚至会落下“不孝”的名声。于是神宗让众臣们畅所欲言，从他们的口中道出仁宗、英宗时期的积弊，这样不但避免了舆论的沸腾，还落下个“广求直言，从善如流”的好名声，可谓一举两得。

老臣张方平首先出马。他说：四年两遭大难（指仁宗、英宗先后驾崩），实乃国家之大不幸，由此而带来财费不贍、府藏虚空的后果。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理财，“财用者，生民之命，为国之本，散之甚易，聚之实难。财用不足，生民无以为民，国非其国也”。太祖、太宗时国家财用充足，但康定、庆历以来即入不敷出，只存空簿。他建议三司及州县对各地官员数目及费用作一详细统计，严格管理，节省开支，“至于诸色用度非所急者，不以小畜为无益而弗为，不以小费为无伤而不节，深虑经远之计，以底烝民之生。方今之切务，莫先于此矣”。张方平的一席话道出了当时国家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即财政问题必须解决。他提出的关于节省英宗陵寝费及赏赐费的计划，比仁宗所费节约了十之七八，使神宗非常满意。在张方平起草的诏书上，神宗称赞他说：“卿文章典雅，焕然有三代之风，又善以丰为约，意博而辞寡，虽《书》之训诂，殆无加也。”可以说神宗对他是颇为赏识的。

龙图阁直学士韩维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他强调不仅要节省各种支出，还要厉行节约，皇帝本人更要躬行节俭，作出表率，处处以强国富民为意。神宗马上采纳了他的建议，令裁减各种冗费。韩维接着又提醒神宗三件事：一是要看准当前需要处理的大



事，其余从略；二是执政者皆为两朝大臣，应推诚加礼，多多咨询；三是百官各有其职，应使他们各负其责，不可越俎代庖。这三点后来也成为神宗行事的准则。韩维还指出：“天下事不可猝为，人君设施，自有先后。”神宗是性格比较急躁的人，这一点他很难做到。

司马光代王陶为御史中丞后，上书论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国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赏，曰必罚，他说：“臣获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献，平生力学所得，尽是在是矣。”这些建议尽管非常精辟，但比较抽象，是典型的书呆子式的议论。

司马光比较切中时弊的建议，是力主禁止宦官参政。神宗继位后，在大臣们的坚决要求下，相继采取了一些措施，罢免了一些宦官的职务，但被称为“高直奏”（因其每闻外廷议论，必入以告，故称）的幹当御药院高居简等人仍留用如故。司马光大为不满，上书指斥高居简资性奸诈；工谗善佞，久处近职，罪恶甚多，为众人所痛恨。司马光对神宗重用高居简的做法提出批评，指出不仅不治罪，反而“使宠信之恩，过于先帝”，应明治其罪以解天下之惑，服天下众人之心。神宗敷衍说，等英宗丧事办完再说吧。司马光严肃地说：“闺闼小臣，何系山陵先后！舜去四凶，不为不忠；仁宗贬丁谓，不为不孝。”神宗终于答应罢高居简为供备库使。鉴于历史上宦官误国的不少教训，几天后司马光又上书神宗，苦口婆心情真意切说到：

窃闻陛下好令内臣采访外事及问以群臣能否，臣窃以为非宜。陛下内有两府、两省、台谏，外有提、转、牧、守，皆腹心耳目股肱之臣也。诚能精择其人，使之各举其职。则天下之事，犹一堂之上，陛下何患于不知